

爵與雀—— 從本院新入藏西周斗形爵談起

■ 吳曉筠

本院今年承國際著名收藏家范季融先生慨贈西周晚期〈變形龍紋斗形爵〉（圖1），此器類相當稀有，且為院藏所無，因此別具意義。范先生之青銅器收藏以「首陽齋」為名，曾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上海博物館及寧波博物館展出，馳名國際。因其收藏質量兼備，向來為學界所重，有許多專門的研究論著討論其收藏的重要性。此次捐贈之斗形爵，即為學界討論的重點之一。究竟什麼才是古代經典及禮書中周代貴族使用於重要儀式典禮的爵？此器即是重要例證。筆者曾於2015年1月在本刊介紹三足爵的發展脈絡，現藉由介紹新入藏品的機會，補充前文，向讀者介紹目前學界對於爵的認識。



圖1 | 西周晚期 變形龍紋斗形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足爵與斗形爵

爵是古代祭祀儀式和獻酌賓客必備的酒器，也是貴族表彰身份的載體，因此在古代文獻中具有重要且鮮明的地位。一般所熟知的爵為深筒狀器身，口沿上有對稱的帽柱，前後則有長長的流口及尖尾，在傾倒美酒嘉釀時呈現優雅的線條。器身一側有作為把手的半環形鑿，器身下為三個尖椎狀足。（圖2）三足爵的發展淵遠流長，自青銅禮器在中原出現之初的二里頭文化時期（約西元前1800～前1520）便已製作，可以說是中原地區最早出現的成熟青銅器類型。嗜酒的商代（約西元前1600～前1046）貴族極重視三足爵，大量隨葬於貴族墓葬，並為周人學習仿效，在大約西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建立周朝後，延續使用。

此次新入藏的爵與一般所熟悉的三足爵有很大的差別。用來盛酒的器身為斂口的扁橢圓杯形，下面接著一個鏤空圈足。器身一側為寬短曲柄，飾鏤空雙首龍紋。另一側為帶有獸首裝飾的半環形鑿。與此器十分相近的例子見於陝西扶風五郡西村西周青銅器窖藏。這種爵因其形態特徵像斗又像勺，最初多被稱為勺，後有林巴奈夫依據北宋聶崇義《三

禮圖》（1175），考釋為瓚。現在多將之稱為斗形爵，或如孫機將之稱為瓚形爵，是因為1976年出土於陝西扶風雲塘村的一件同類器，器柄上有「伯公父作金爵」銘文，明確說明此器為西周晚期一位叫做伯公父的貴族訂製的銅禮器「爵」。（圖3）這一發現促使古文字學界對「爵」字的認定方式，以及如何理解兩種爵天壤之別的差异進行深入研究。



圖2 | 商 子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 西周晚期 a.伯公父爵；b.器柄局部；c.銘文拓片 取自曹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3》，頁486、491。

李零依據「爵」字的特徵及唐代孔穎達（574-648）對《禮記·祭統》的解釋，提出古人說「爵為雀形，以柄為尾」，認為斗形爵才是真正符合爵的器形。並據漢代鄭玄（127-200）對《儀禮·士虞禮》中記載的廢爵、足爵兩種爵的解釋，認為足爵有足、廢爵無足，提出三足爵為足爵，斗形爵為廢爵的說法。何景成則由戰國時期（約西元前468～前221）的楚簡文字出發，為斗形爵正名。閻步克又據圖像及實物資料提出了一種新觀點，在兩種爵之後，春秋時期（約西元前770～前468）典禮所用及禮書所記載的爵，是現在稱為卮的杯形器。

李學勤由考古發現認為兩種爵並非同時使用，而是替代關係。三足爵的器形延續了將近八九百年，自二里頭時期出現，西周中期以後便很少使用。斗形爵則是自西周晚期開始出現。三足爵減少與斗形爵出現的時間點，與學者所提出的西周禮制改革頗為相當，或許也是周人進行禮儀革新的一個環節。而斗形爵的器形來源，如羅森（Jessica Rawson）所提出的，可能與西亞流行的一種器形相近的長柄杯有關。本次入藏的斗形爵，即是這種器類的較早形式。雖然沒有銘文，但附有獸首形鑿，圈足及柄部紋飾鏤空，在形制及裝飾上較前述雲塘出土之伯公父斗形爵更繁複華麗。據伯公父斗形爵的銘文，這種器物的功能是「用獻、用酌、用享、用孝」，參與著多樣的獻酒儀式。嚴志斌也依據考古出土現象，提出周代斗形爵與觚在儀式上搭配使用的組合關係。

與三足爵相比，斗形爵無三足及流口，又有三足爵所沒有的扁平長柄，兩者在持拿及用法上應該完全不同，更與現在認知三足

爵為溫酒器的功能有別。這樣的差異使許多學者進一步投入研究兩種器形在周代定名及使用上的區別。除前述李零「足爵」與「廢爵」的說法，王帥據伯公父爵銘文及斗形爵的荐酒功能，提出應將斗形爵稱為「獻爵」。近來更有李春桃提出三足爵不是爵，而應該改稱為「觴」。

無論如何，斗形爵現在是學界公認的周代爵，但是在西周、春秋時期遺址中發現數量不多，使用並不普遍。西周時期的例子集中發現於陝西宗周一帶，唯一一例發現於山東長清雙泉南府村。似乎西周斗形爵在山東得到了傳承，在山東安丘山一座春秋時期墓葬，發現了一件與西周形制相當的斗形爵。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更在山東得到了極大的發展，許多銅質及陶質的斗形爵發現於山東的貴族墓葬，並發展出了新的風格。此時，盛酒的杯形器身加高了許多，西周時期斗形爵的龍首鑿一變而為具像的勾喙立鳥。這樣的附鳥造型在山東特別流行，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考古出土的例子很多。最特別的是滕州薛國故城出土的春秋晚期鳥斗形爵，以杯



圖4 春秋晚期戰國早期 鳥斗形爵 山東滕州薛國故城出土
取自嚴志斌，〈薛國故城出土鳥形杯小議〉，《考古》，2018年2期，頁100，圖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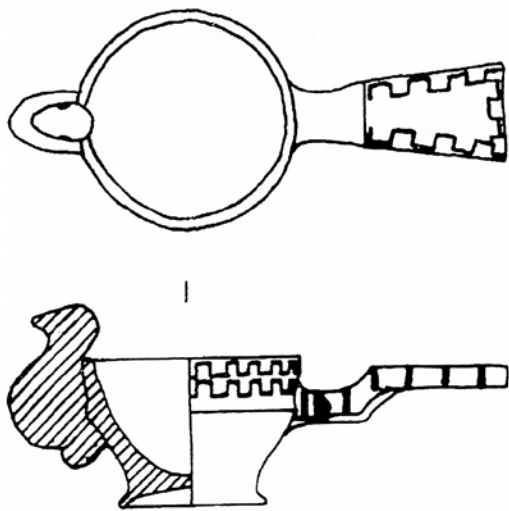


圖6 戰國 銅鳥斗形爵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頁285。



圖5 戰國早期 陶鳥斗形爵及附鳥器蓋 山東煙台金溝寨出土 取自煙台市博物館，《山東煙台市金溝寨戰國墓葬》，《考古》，2003年3期，頁22及圖版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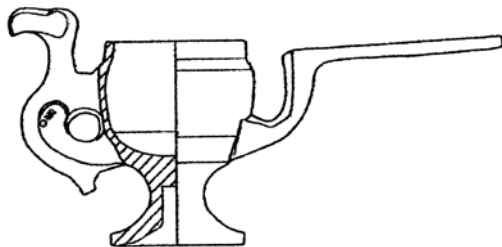


圖7 戰國早期 陶鳥斗形爵 山東曲阜魯國故城出土 取自韓輝等，《魯故城及周邊墓葬相關問題初步分析》，《傳承與創新》，頁230。

形器身為鳥的身體，前面加上鳥首，側面添上展開雙翼，原來的曲柄則自然形成了長長的雀鳥尾巴。（圖4）更普遍的是以陶製作的彩繪立鳥斗形爵。如煙台金溝寨戰國早期墓葬出土了帶有立鳥形雕塑的陶質斗形爵，更有站著三隻可愛小鳥的陶器蓋及魚鳥紋陶器，展現了貴族對鳥禽的喜愛。（圖5）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銅質的鳥斗形爵，也與山東所見陶斗形爵十分相似。（圖6）鳥斗形爵形成及開始流行的時期恰為生長於山東魯國的孔子所處的時代。在曲阜魯國故城，立鳥斗

形爵經常出土於貴族墓葬，想必孔子對之也是相當熟悉的吧！（圖7）

戰國時期，斗形爵除了發現於山東，不遠處的河南輝縣也發現一件與山東所見相近的陶質鳥斗形爵。更多以漆木為材質的斗形爵則出自南方楚國，做為如曾侯乙等高級貴族的隨葬品。在這裡，除包山楚墓發現了一件極華美的漆雙聯斗形爵上有展翅的立鳥（圖8），一般的斗形爵鮮少裝飾成具象的立鳥，而多帶有曲柄及半環形鑿，更接近西周的樣式。（圖9）在出土的楚簡文獻中，「爵」字也被寫成這種長柄杯的形式。此時正是古典思想蓬勃發展的時期，對周代禮儀的追求，也促進周代禮儀的彙編與考證。漢代以降被奉為儒家禮儀經典的《周禮》、《儀禮》、



圖8 戰國 漆雙聯斗形爵 湖北包山楚墓出土 取自高濱秀、岡村秀典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先史·殷·周》，頁285。

《禮記》，即是逐漸形成於這一時期。禮書中所追溯的西周禮儀，以及雜揉的東周實況，爵在其中佔有顯著地位。而斗形爵必然是時人認知爵的唯一樣式。

從東漢《說文解字》到北宋《博古圖》：北宋文人的闡釋及影響

漢代賦予周代禮制極高的地位，但禮器的形式卻不追求復古。周代禮器主要通過文字記述的方式流傳。最常被引用的關於爵的漢代文獻是東漢許慎《說文解字》（100）。「爵」為鬯部，鬯即周人對酒的稱呼。釋意為「爵，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說明爵是手持飲酒之器。「爵」字為象形字，基本符合從西周時期伯公父斗形爵到戰國時代楚簡上「爵」字表現出的斗形爵器形。而「節節足足」歷代均釋為雀鳥的叫聲。孔穎達對《禮記》所載爵的詮釋：「爵為雀形，以尾為柄」，或有其他文獻提出「爵」與「雀」同音。因此如李零、嚴志斌等均已提出的，這些文獻描述的爵是戰國早期雀鳥斗形爵的樣態。



圖9 戰國 漆斗形爵 湖北曾侯乙墓 取自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漆器全集·1·先秦》，圖版80。



圖10 陶瓷雀鳥斗形爵 a.東漢 陶雀鳥斗形爵 廣州漢墓出土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州漢墓》，圖版135-9；b.五代 越窯 雀鳥斗形爵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耿寶昌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頁253。

東周立鳥斗形爵的器形在漢代以後也有延續。東漢廣州漢墓出土的一件陶器及另一件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五代越窯器，均與東周器形頗為相近，但尚無法確知當時是否認知這種器物為爵。（圖10）作為禮器的鳥形爵則如謝明良已論述的，唐代恭陵哀皇后墓（卒於676）出土的復古陶爵，做成一隻鳥



圖 11 唐 陶爵 恭陵袁皇后墓出土 取自郭洪濤，〈唐恭陵袁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與文物》，2002年4期，頁14。

背負著一個杯子，下部的足殘缺了，但應是圈足。（圖 11）許雅惠提出袁皇后陶爵杯等唐代禮器，反映了漢代以來一直流傳著周禮禮器樣式的參考書《三禮圖》。到了北宋時，由聶崇義彙整前代版本，重新彙編了《三禮圖》（962），保存了漢唐時期禮器爵的基本樣式。（圖 12）

當北宋興起研究、收藏三代古銅器的風氣，帶動了檢討舊說的需要。其中尤為普遍的研究方法是將古代器物與「尊文譯器」的《三禮圖》禮器圖繪進行對比。蘇軾（1046-1100）即為早期古銅器收藏社交圈中的一員。他的友人歐陽修（1007-1072）在描述他所收藏的銅敦時謂「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文，遂以為『敦』爾。」這段文字反映了當時強調考察器形與器名的新風氣。三足爵出現於士大夫的視域，更引發了對器名、器形的討論。現在可見最早的紀錄是北宋呂大臨（1046-1092）的《考古圖》



圖 12 宋 聶崇義 《三禮圖集註》 爵 清乾隆間寫四庫全書舊要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001622

（1092）。書中收錄同時期著名收藏家李公麟（1049-1106）在內的收藏家珍藏的四件三足爵。（圖 13）總體來說，呂大臨認為「今禮圖所載爵皆於雀背負瓊，經傳所不見，固疑不然。今觀是器前若喙，後若尾，足脩而銳，其全體有象于雀，其名又曰舉，其量有容升者，則可謂之爵無疑。」由器上銘文的「舉」字，論述古代舉爵獻賓的儀式。器形上，則將三足爵流、尾伸展，以及細尖椎足的特點，與鳥的姿態比附，推翻《三禮圖》的描繪，而將三足爵確定為文獻記載的爵。這不是呂大臨的個人觀點，而是反映了當時士大夫對古代銅器的集體認識。其後更反映於宋徽宗（1101-1125 在位）敕編的皇家古銅器圖譜《宣和博古圖》（1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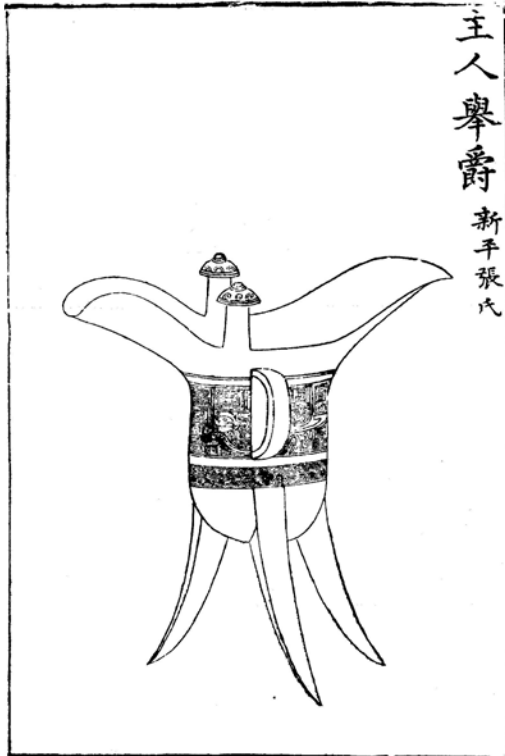


圖13 宋 呂大臨《考古圖》主人舉爵 取自《泊如齋重修考古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325。

謝明良已提及，無論就文獻或考古資料，宋代以後一直並存著《三禮圖》和《宣和博古圖》兩種主要的禮器系統。南宋洪邁（1123-1202）《容齋三筆》（1196）記述：「又今所用之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可笑。」文中，他以知識份子的身份嘲笑地方上依《三禮圖》製作的雀鳥形爵，但其實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三禮圖》存在的長期影響。更晚的例子如謝明良所辨識的，陝西延安一座元代墓葬，也發現了一件依據《三禮圖》樣式製作的雀鳥形陶爵。

在以三足爵為爵的標準器形的時代，如何平衡《三禮圖》和《宣和博古圖》禮器的表述，也是經學家注意的問題。清乾隆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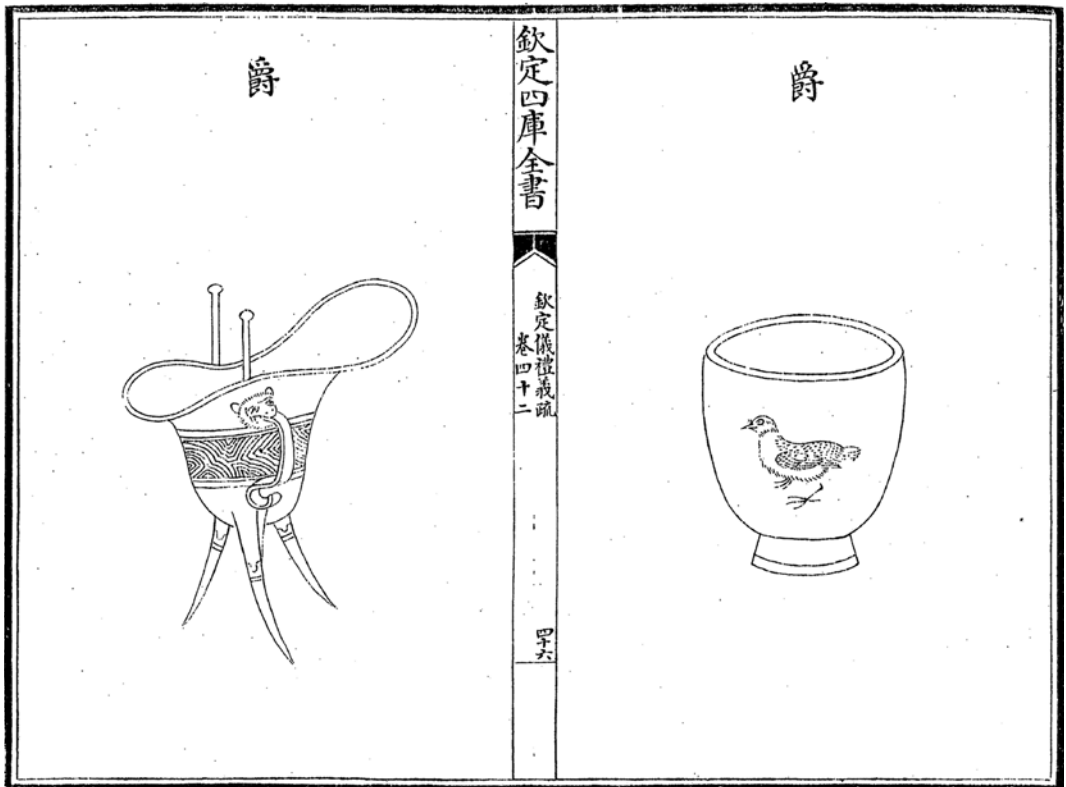


圖14 清 乾隆敕編《欽定儀禮義疏》爵 取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47年（1782）文淵閣本影印，冊107，頁467。

年（1748）敕編的《欽定儀禮義疏》，著重表現禮器的圖繪，對《儀禮·士虞禮》所記載的「足爵」與「廢爵」應該是什麼樣子，也有了綜合的詮釋：足爵為三足爵，廢爵無足，為圓杯形，其上繪有雀鳥圖案。這樣的設計頗似《三禮圖》六尊六彝中將動物圖案畫在器表的方式。（圖 14、15）

禮書中另有一種「匏爵」。《禮記·郊特牲》謂「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歷代解經的書籍對之衍伸，認為是祭天所用，因此有了匏爵這種禮器。禮器圖中多將匏爵繪成匏瓜半剖的葫蘆勺形。乾隆皇帝（1735-1795 在位）注意到這種器類，在進行皇朝禮器改革時，為天壇、祈穀壇及地壇所用的匏爵做了全新的設計。將勺形改為杯形，並設計了有細直三足的托座，以呈現三足爵的意象。在不經意的情

況下，將古代三足爵的足與勺形爵的杯結合，為爵的發展帶來了另類的呈現。（圖 16）



圖 16-1 清 允祿等奉敕纂《皇朝禮器圖式》 天壇正位匏爵 清乾隆31年（1766）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24309



圖 15 宋 聶崇義《三禮圖集註》 雞彝 取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29，頁198。



圖 16-2 清 乾隆 匏爵 北京市天壇公園管理處藏 作者攝

爵與雀的華麗聯想：古典又創新的三足雀角

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有一種與三足爵相近的器物，被宋人稱為角。兩種器物的區別在於角沒有帽柱，且爵的長流口改為與另一側相對稱的上揚尖尾。（圖 17）雖然器形相近，但沒有流口的設計使角裝盛的液體不易傾倒，一些考古出土的角還帶有器蓋，因此在使用上應與爵不盡相同。角自宋代即著錄於《宣和博古圖》。這一名稱是宋人據禮書記載而來，如《禮記·禮器》曰：「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也因此將之視為地位較低者的飲器。明代延續宋代以來的古銅器鑑賞風氣，在描繪文人文會的作品中也可以見到角的身影。（圖 18）



圖 17 | 商 銅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8 | 明（原題宋劉松年）博古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角的形態與爵相近，兩尖尾平衡伸展的樣子，使之容易與雀鳥展開雙翼飛翔的美妙平衡聯想在一起。至少在十七世紀的明代，一些銅角被加上了雀鳥展翅的器蓋，並著錄於乾隆朝編纂的宮廷古代銅器圖譜。如《西清古鑑》（1751）記載的「周庚角」，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即是一件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形式的銅角，配上不晚於十八世紀製作的鳥形器蓋。（圖 19、20）器蓋與器口接合的完美弧度，雀鳥的對稱樣式，表面的綠鏽，以及邊沿的缺口，非常有說服力的表現兩者合而為一的存在。因此，當時的鑑賞家對這一組合的正確性深信不疑。在這一基礎上，衍生出了許多按此製作的仿古作品，如現藏於本院的明晚期錯金銀獸面紋角，器表錯金銀的裝飾手法，為明晚期銅器的裝飾特徵，是一件迎合市場喜好的仿古作品。（圖 21）



圖 19 清 梁詩正等奉敕撰 《欽定西清古鑑》 周庚角 清乾隆20年（1755）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36770



圖 20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銅角 附明清時期 鳥形器蓋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1219> (Public Domain)，檢索日期：2020年8月10日。



圖21 | 明晚期 錯金銀獸面紋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爵與雀的諧音及關聯性，也使雀鳥與爵位、功名相聯繫。雀鳥圖案成為廣受歡迎、富有吉祥寓意的藝術主題，如院藏明〈歲朝百爵〉，描繪一百隻雀鳥聚集在一起，暗示百官來朝的吉祥景象。（圖22）

結語

雖然學界仍在持續討論上古時代爵的界定問題，但由更長期的歷史發展來看，不同時代均賦予兩種爵多元化的當代理解及詮釋。綜觀爵的發展，三足爵與斗形爵的歷史緊密交織，成為文化發展的觸媒及載體，歷久彌新。

參考資料

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州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 中國漆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漆器全集·1·先秦》，福州：福建美術出版社，1997。
3. 王帥，〈略論考古發現中的青銅斗形器——兼說伯公父爵與「用獻用酌」之禮〉，《古代文明》，2卷4期，2008年10月，頁40-46。
4. 李春桃，〈從斗形爵的稱謂談到三足爵的命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本1分，2018年3月，頁47-118。
5. 李零，〈讀《首陽吉金——胡盈瑩與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萬變——李零考古藝術史文集》，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67-89；《鏤古鑄今——考古發現和復古藝術》，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2005。
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青銅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
7. 孫機，〈說爵〉，《文物》，2019年5期，頁41-47。
8. 耿寶昌主編，《中國文物精華大全·陶瓷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9. 杰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紅瑪瑙珠、動物塑像和帶有異域風格的器物——公元前1000～前650年前後周及其風國與亞洲內陸的交流跡象〉，《祖先與永恆——杰西卡·羅森中國美術考古論文選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頁397-462。
10. 高濱秀、岡村秀典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先史·殷·周》，東京：小學館，2000。
11. 曹璋主編，《周原出土青銅器·3》，成都：巴蜀書舍，2005；寶雞市考古研究所、扶風縣博物館，〈陝西扶風五郡西村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8期，頁4-27。
12. 許雅惠，〈宋、元《三禮圖》的版面形式與使用——兼論新舊禮器變革〉，《臺大歷史學報》，60期，2017年12月，頁57-117。
13. 郭洪濤，〈唐恭陵皇后墓部分出土文物〉，《考古與文物》，2002年4期，頁9-18。
14. 陳芳妹，〈宋代「金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宋代青銅器與宋代文化史》，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1-91。
15. 煙台市博物館，〈山東煙台市金溝寨戰國墓葬〉，《考古》，2003年3期，頁18-26。
16. 閻步克，〈由《三禮圖》中的雀杯爵推論「爵名三選，爵有四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56卷6期，頁132-146。
17. 謝明良，〈北方部分地區元墓出土陶器的區域性觀察——從漳縣汪世顯家族墓出土陶器談起〉，《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7，頁149-189。
18. 韓輝、王春云、田樹標，〈魯故城及周邊墓葬相關問題初步分析〉，《傳承與創新——考古學視野下的齊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224-242。
19. 嚴志斌，〈薛國故城出土鳥形杯小議〉，《考古》，2018年2期，頁99-106。
20. Louis, François. *Design by the Book: Chinese Ritual Objects and the Sanlitu*. New York: Bard Graduate Center, 2017.



圖22 | 明 歲朝百爵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